

專題研究

# 90年代中國大陸社會文化轉型的 反思與探討

The Examination and Explo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of PR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90s

林奎燮 ( Lim Kyoo-Seob )

韓國慶熙大學亞太地域研究院研究教授／東北亞合作中心負責人

## 摘 要

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方案和文化討論，都無法與「全球化」語意分開。在此討論中，將焦點放在探討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文化霸權勢力如何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層面操控著中國大陸；同時，面對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操控，處於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又是如何對抗西方文化霸權勢力的全球宰制。中國大陸要堅持民族自尊，提倡「本土化」和「中華性」，抗拒西方文化霸權，從中國的經驗現象中提煉出全新的概念和理論體系。在此藉著探析 90 年代有關文化批評論述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帶出後殖民主義在文化邊陲的認知和轉化，並探察後殖民主義研究所引起有關「中國性」的討論，為中國性在全球化論述生產的新格局重新定位。全球化的浪潮基本上更加劇了衝擊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中共必須要在意識形態上釐清一條明確的道路，或者重新建構其社會主義的精神。本文藉由「全球化」、「文化霸權」、「本土化」與「後殖民主義」等理論，做為研究觀點建構的基礎。而在此探討中，重點在於從「世界體系」的觀點出發，並以中國大陸 90 年代的社會文化發展脈絡途徑為主，以詮釋世界體系中「西方」與「中國」二者之間所呈現的文化上的依附關係。藉此再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文化結構與中共意識形態結構受到哪些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的牽引與形塑，才能瞭解當今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結構的轉變。

關鍵詞：中國文化、中共意識形態、中國特色、全球化、本土化、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

## 壹、前 言

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經濟活動與國際社會的漸次接軌，中國大陸雖然獲取了極大的發展利益，讓中國大陸加深也改變了與國際的相互瞭解與認知。但是，在與世界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的同時，卻也衝擊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各層面，在這種認知調整與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除了中國大陸本身「內部因素」影響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外部的「全球化」因素同樣也深深牽動著中國大陸的一切行為。並且，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促使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在社會價值體系上也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並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分化與多元。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思想界，也與同步進行的「中國現代化」變革緊密相關。隨著變革的深入和問題的複雜性的呈現，「思想界」也不斷的分化和重新整合。二十年來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組合，幾乎都可以從中尋找到基本的脈絡：既有渴慕西方現代化的同質性訴求，又有對其進行批判和反思的潛在性格。文化態度的同一性與思想內涵的異質性，構成了這一時期思想運動混沌的表象和複雜的內在分歧，成為 90 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界分化的淵源所在<sup>1</sup>。

因為經濟發展上的需要，中共放鬆了對於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控制並且逐步與國際社會接軌。不僅資金、技術與產品流入中國大陸，同時一些外來的思想意識文化，也深深的影響著中國大陸。在這樣的條件下，自 90 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活動與科技在全世界的快速發展，在國際社會中掀起了一股所謂全球化的浪潮，這股浪潮一方面衝擊了中國大陸與世界既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快速改變了中國大陸對世界及與自身關係的認知圖像。這種衝擊與認知產生了交互影響的作用，衝擊影響了原有的認知，而認知的重新調整又產生了對衝擊的調整，進一步回頭改變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sup>2</sup>。因為全球化帶領的變化仍在全球範圍中展開，改變了過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的一些思考與假設，新的社會結構因不同的生產型式而生，是故，生產、經驗以及權力的關係在新的時空中呈現更豐富的風貌，因此，與此有關的是「文化」及「集體認同」也受到影響。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全球化理論」與「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架構，最

<sup>1</sup> 事實上，90 年代思想界的所有變化，幾乎都可以在 80 年代找到其蹤跡和脈絡。從這個意義上說，80 年代與 90 年代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參見：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 50 期，1998 年 12 月），頁 4、9。

<sup>2</sup>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43 卷第 4 期，2000 年 4 月），頁 2。

能跟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溝通<sup>3</sup>。全球化是當前中共所極力推展的外交政策選項之一，而後殖民主義論述則是「傳統」處在被殖民情境氛圍中的中國大陸學者，最能跟他們將心比心<sup>4</sup>。因此，本文藉由「全球化」、「文化霸權」、「本土化」與「後殖民主義」等理論的論述，以做為本研究觀點建構的基礎。而在此探討中，重點即在於從「世界體系」的觀點出發，並以一個歷時性的社會文化發展脈絡取徑為主，以詮釋世界體系中，西方與中國二者之間所呈現的文化上的依附關係<sup>5</sup>。進一步從歷時性的推動來看，深入探討中國大陸文化結構與中共意識形態結構受到哪些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的牽引與形塑，才能瞭解中國大陸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再者，要理解全球化過程對此地所引起的作用為何，則必須把本土政經文化環境的特殊性放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脈絡中去剖析現今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結構的轉變，這些都是在此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sup>3</sup> 「全球化理論」與「後殖民主義論述」其實是兩條看似相同又不太重疊的研究路徑，「全球化」所關注的是時空的壓縮、地理疆界的模糊與主權觀念的淡化等，它既是一種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也是一種經濟的擴展過程，整個世界經過全球化所構成的緊密網路，讓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成一個普遍聚合的現象。這也促使「現代性」(modernity)呈現出一個新的意義，也就是透過新的理性主義的發揮，讓那些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地被大規模的商品消費主義給一一打破，過去那種閉關自守的「傳統主義」也將無以為存。相反的，在全球化的擴展過程中，「後殖民主義者」則把它視為是一種資本主義假借新的概念，進行第二次殖民的運動，因此，全球化在他們的眼裡，其實並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本質，這就使得一些「本土主義者」、「反全球化者」與「後現代主義者」，有一個反對全球化的正當性基礎，他們除了開始尋找一種對國家與家園的認同性，也回頭去發揚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並從「身分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改造」上，重新建構一個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處所。就因這兩種主張是朝著逆向而行，於是全球各地所出現的這兩股思潮就不斷的激盪著當代人心，也變成是當前世界思潮論辯的主流。從這樣的觀念來看，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其實並未脫離這兩個思潮所帶來的思維衝擊。在中國大陸一面進行改革開放，一面又堅持後殖民主義論述，不斷的批判美國的霸權主義之下，美中關係本來就呈現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sup>4</sup> 王崑義，全球化與臺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臺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年9月），頁5-7。

<sup>5</sup> 「文化」是一定歷史社會的產物，它建立在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並受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各種社會條件的影響和制約。社會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某種社會形態文化的產生、發展、變化和消亡的歷史，與一定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及其所在社會的經濟關係、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的發展變革緊密相連。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不同的歷史時代和社會發展階段，必然要求，也一定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文化。社會文化又是對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等能動的、積極的反映。某種文化一經形成就具有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能動性，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等發生影響和作用。同時，在當代條件下，一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國際大環境，離不開世界文明發展的總潮流。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和制約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因此，考察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文化，必須放在世界文明發展的總潮流和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大環境中進行，必須從中國大陸現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基本國情出發，才能得出科學的認識。參見：于幼軍，論中國現階段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1月），頁28。

## 貳、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認識

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方案和文化討論不管是從甚麼角度來談，都無法與「全球化」語意分開。在此探討中，將焦點放在探討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文化霸權勢力如何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層面操控著中國大陸，同時，面對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操控，處於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又是如何面對西方文化霸權勢力的全球宰制。Samuel Kim 認為，大部分東亞國家對全球化的觀點採取了一種類似「轉化論」<sup>6</sup>（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的立場時，中國大陸還比較停留在基於「現實主義」的立場而對全球化採取一種較保守的態度，就是說，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觀點基本上還是一種「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c）的觀點<sup>7</sup>。目前，在中國大陸有兩個最為流行的全球化理論：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種是「西方左翼」的。這兩種理論雖然出發點和觀點不同，但是都有上升為西方新的意識形態的可能<sup>8</sup>。龔剛也認為，以「民族國家」立場對抗「全球化」，是難以避免的現象。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往往威脅到民族國家的自主存在與現實利益<sup>9</sup>。

### 一、全球化是一種西方的文化霸權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不但大大的改變了中國大陸經濟狀況，也改變了社會和文化結構以及中國人的心態和生活模式。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也自然的引進了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潮。西方的文化和思潮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而勢不可擋的在全中國範圍氾濫起來的事實，證明了當代西方

<sup>6</sup> 「轉化論」，可說是前兩個極端立場間的一種妥協與調和。他們認為，目前的全球朝著相互關聯的變化過程，其關聯程度是一種密度之高、範圍之廣、速度之快、影響之深的過程。這種過程的驅動力是一種混合的現代性力量，它不僅使得民族國家產生了一種自我重新建構和轉化的過程，而且連整個世界的秩序也在重新建構，然而，此種轉化的過程之未來，是朝向全球的整合或分散化，尚在未定之天。參見：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臺北：第39卷第8期，2000年8月），頁73-82；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 Jonathan Perraton 著，*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 and Culture*；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鈴譯，*全球化大轉變*（臺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頁1-40。

<sup>7</sup> 同註2，頁19-20。

<sup>8</sup> 楊雪冬，*全球化（Globalization）*（臺北：揚智文化，2003年6月），頁211-214。

<sup>9</sup> 但是，對抗的模式卻存在差異，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話語」層面的對抗，也就是通過情緒化或理念化的表述，表明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利益的損害，由此實現對全球化的抵抗；另一類是「制度」層面的對抗，也就是通過一整套理性化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應對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利益的衝擊。這一層面的對抗，有賴於一個合法化的機制來定義民族利益，繼而擬定相應的行動準則，這就要求一個民族國家首先要完善自身內部的建制。參見：龔剛，「民族認同與文化抵抗：對張承志的文化社會學評註」，*中國研究*（香港：1999年第5期），頁134。

文化和思潮的威力，展現出文化和思潮是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主要動力之一。1949年起，中國大陸排斥「西方中心論」的思維，轉向共產主義的蘇聯靠攏，獨尊馬列主義，整個社會變得更為封閉。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共重新面向「西方」，正式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體系。1990年蘇聯與東歐的變革，中國大陸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面對全球化衝擊的最後一個重要堡壘，仍然繼續其「四個堅持」，但是舉國上下幾乎不再排斥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發展與利益。中國大陸的社會也就隨著改革開放有著巨大的改變，全球化更加速著這種變化。中國未來的命運，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裡，也就格外顯得矚目與爭議。

金鑫認為，對外文化擴張和滲透是美國稱霸世界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的決策者歷來認為，美國的文化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輸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國的文化成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國就能在任何時候比任何國家都要強大，就能在國際社會居於領導地位。他強調說，「導彈+經濟+文化=美國式的全球化」，這是美國圖謀稱霸世界的公式。在國際關係中，「文化擴張」主要指一國將其傳統文化、政治觀點、價值觀等傳播或強加給其他國家，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激烈競爭的國際舞台上，許多國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觀念影響著國際關係。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把文化擴張和滲透作為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在對外關係中極力推行「文化帝國主義」<sup>10</sup>。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推行其「文化霸權主義」，把對外的文化擴張和滲透作為實現其霸權主義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sup>11</sup>。也就是說，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商品文明，在藉由市場機制進入中國大陸社會的同時，也開始影響並融入中國大陸的文化。

## 二、全球化語意下的中國大陸文化

「文化」或「認同」都是在不同的時空下因應民族/族群的需要而被建構/形塑出來的<sup>12</sup>。中國大陸在中共建政後，因為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對於「文化」的討論都必須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上。中國大陸的學者多將中國文化的研究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共產主義如何進行現代化的方向上。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的同時，文化領域內也面臨劇烈的轉型，人們既有的價值

<sup>10</sup> 金鑫認為：所謂「文化帝國主義」，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憑藉其政治、經濟、語言、技術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實行文化滲透，力求建立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其政治、經濟霸權的「全球文化」。這種「全球文化」，實際上是英語文化，更準確地說是美國文化。文化帝國主義則憑藉文化滲透不動聲色地征服各國人民的心，使得他們自覺地服從超級大國的霸權。文化帝國主義的對外宣傳，既是無孔不入的，又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幾乎沒有甚麼人能完全擺脫它的影響。文化帝國主義是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出現的。

<sup>11</sup> 金鑫，中國問題報告：新世紀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1年9月），頁281-282。

<sup>12</sup>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臺北：生智文化出版社，2003年5月），頁127。

意義體系，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戰、徬徨困惑與重建。在此之前，所有文化都是政治文化，是政治意識形態或其延伸，而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擴張，文化也漸次鬆綁，長期禁錮的文化潛力，一旦爆發，勢必銳不可擋。也因此，文化並不只是中共「經改」的依變數，它同時也「能動的」作用於經濟的變遷，故兩者之間的關聯是辯證互動的。文化的這種「先導作用」，首先表現在權威當局統治之意識形態的鬆綁，具體而言，即是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轉折<sup>13</sup>。

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轉型時期，原有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並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潮流的衝擊。這一切均造成了當代文化的多元共生、互融互補之格局。中國人在面臨東／西方文化的異同之中，很快的反省自己所處的位置並希冀建構一套中國論述式的自我認同，以有別於西方論述下的「中國圖像」與「中國認同」，所以是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文化的<sup>14</sup>。

由於全球化的作用，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大陸以及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也受到波及，全球化在文化研究領域裡所表現出來趨勢也就被人稱為「文化全球化」<sup>15</sup>。換言之，90年代以來所面臨的文化問題，是全球的後現代化，或說後現代式的全球化，其中又夾雜著跨國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造成的現象。中國大陸在這一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最初是在歐美，後來發展到拉丁美洲、日本乃至非洲。中國的介入對這場辯論提供了新的論據，也提出了新的質疑。這也就是後現代主義在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共性和特性問題。換句話說，這就是不同選擇的現代性、後現代性問題。20世紀以降，中國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傳統，這可以稱之為一種與西方社會和文化不同選擇的現代性<sup>16</sup>。在中國大陸，對於「中國國情」的不同認識是90年代「現代性反思」各派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這種對中國大陸現實的不同認識與定位，導致他們對於西方理論的不同取捨以及批判話語的不同建構方向。因此，對於中國國情的全面而準確的定位，應當說是目前這場論爭需要解決的關鍵所在<sup>17</sup>。

### 三、全球化語意下的「中國特色」

<sup>13</sup> 蔡佩君，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公共領域之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頁74-75。

<sup>14</sup> 賴皆興，中共意識形態發展中的後殖民意涵：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三個代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5月），頁95。

<sup>15</sup> 王寧，全球化與文化研究（臺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3年2月），頁197。

<sup>16</sup> 魯曉鵬，文化、鏡像、詩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頁「自序」7。

<sup>17</sup> 陶東風，「從呼喚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53期，1999年6月），頁22。

「傳統」往往具有二重性，正面與負面、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牽連在一起。而且隨著客觀條件的變易、正負面的功能也可能發生轉化<sup>18</sup>。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一方面奉行鎖國政策；另一方面又進行「破四舊」，即廢除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澈底掃蕩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不可能將五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完全清除，但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在那時，相對說來確實最小。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一方面學習並接受西方的先進文明；另一方面又恢復優秀的傳統文化。如果說，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日益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過程，它同時也是一個復興傳統文化，使西方文明中國化的過程<sup>19</sup>。

湯一介提出了「現代」與「傳統」的關係問題，而且特別強調「現代」與「新傳統」的關係問題。他說，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的重點，則是反對幾千年形成的「舊傳統」；而 80 年代的「反傳統」的重點，則是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的「新傳統」。而且，反對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新傳統，也正是為了保護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中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sup>20</sup>。90 年代的中國文化景觀，不再是知識分子以理性方式影響社會整體，而是被商業性的明星、影歌星和政治活動家取代。80 年代呼喊的「反傳統」文化策略，在 90 年代已自行瓦解，「傳統」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不構成對峙性的力量<sup>21</sup>。因此，90 年代以來，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逐步上升，以及冷戰後中西方緊張關係的突顯，以「中國本位意識」與「華夏文化優越感」為基本內涵的激進思潮漸有抬頭的趨勢<sup>22</sup>。

「中國」在當代全球化語意中，是一個極為獨特的「地方性」，這個地方性既帶有很深的歷史沉澱，又與全球境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sup>23</sup>。反思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如何存在 / 表現 / 發言方面的思想建構，成為 90 年代後期知識界的大事，「全球化」與「本土化」<sup>24</sup>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發展過程並需面對的歷史課題，並且在一種反

<sup>18</sup> 汪澍白，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32。

<sup>19</sup> 俞可平，「導論—全球化：美國化和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和現代化？」，收錄於俞可平主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14。

<sup>20</sup> 湯一介，「文化熱與國學熱」，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31 期，1995 年 10 月號），頁 33。

<sup>21</sup> 張嘉娟，當代中國文化變遷與轉型：兼論「八九民運」文化意義及其啟蒙意涵（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6。

<sup>22</sup> 同註 9，頁 140。

<sup>23</sup> 胡大平，後革命芬圍與全球資本主義：德里克（Arif Dirlik）「彈性生產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320。

<sup>24</sup> 「本土化」是一個至今為止在學術圈尚未獲得一致意見，但卻廣泛使用的概念。和這一概念十分接近的另外兩個概念是「中國化」和「有中國特色的」。在這三個相互接近且常常為人們混用的概念中，「中國化」的歷史最為長久。參見：周曉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會心理學的現代雙翼」，社會學研究（1994 年第 6 期），頁 14。

思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之後，中國傳統文化重新被提出並且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主體的代表<sup>25</sup>。也就是說，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發展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演變成「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認同迷障。

在最近幾年中，中國大陸出現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也要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在此趨勢下，西方國家都運用全球化文化價值的語言指控或攻擊中國大陸，使得中國大陸內部對全球化與文化價值的關係產生了熱烈的討論<sup>26</sup>。也就是說，到了90年代，「反西化」的激情的民族主義話語，躍然成為文化思想界的主流，這在中國大陸理論界意味著，作為中國「他者化」之「現代性」這一知識型的終結，但同時又是它的轉型，就是說，它將逐漸凝縮和移位為一種「傳統」而延續下來，企圖藉助另一知識型：即「中華性」<sup>27</sup>而再次充滿活力，發揮影響力<sup>28</sup>。本土化需要從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吸取養分，但本土化不等於「傳統化」<sup>29</sup>。

實際上，從近代開始，中國不反帝，就沒有獨立自主，不反封建，就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歷史主題的基本前提<sup>30</sup>。因此，中國大陸的「反全球化」話語可能還富於一種「革命情結」<sup>31</sup>。帝國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危機的歷史展現，構成了中國大陸尋求現代性的歷史語意。推動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中的有識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種種弊端。就是說，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總之，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踐包含著「反現代性」的歷史內容。這種「悖論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但更需要在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雙重歷史語境」<sup>32</sup>中解釋<sup>33</sup>。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sup>25</sup> 同註14，頁115。

<sup>26</sup> 同註2，頁9。

<sup>27</sup> 所謂「中華性」具體指：中國的社會文化設計不再以「西方式話語」規範或前東歐、蘇聯式的話語規範徹底歸約自身，而是提出以「小康」為中心的文化取向。「小康」也並不僅為一個經濟發展指標，也是一種文化發展的指標，意味著一種跨出現代性，放棄西方式的發展夢想的方案。「中華性」意味著不再將西方作為中國必須趕超的「他者」，而是悉心關切「民族文化」特徵和獨特文明的延續和轉化。這種以「中華性」為理想的論述（話語）顯然受到「後殖民主義」學理的影響。參見：楊颺，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頁3-4。

<sup>28</sup> 羅曉南，「中國文化何處去：改革開放中的民族主義思潮」，東亞季刊（臺北：第28卷第3期，1997年秋季），頁2。

<sup>29</sup> 同註24，頁19。

<sup>30</sup> 同註18，頁222。

<sup>31</sup> 郝建，「有中國特色的反全球化」，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71期，2002年6月號），頁115。

<sup>32</sup> 這裡所謂的「雙重歷史語境」，就是尋求現代化與對西方現代化的種種歷史後果的反思。

<sup>33</sup> 黃天然，「沒有終結的歷史：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評述」，香港社會科學學報（香港：第9期，1997年春季），頁23-24。

主義新文化，就是把「現代性」的要求融會到「民族性」中來。這就需要處理好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與接受外來文化的關係，力求使所建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既是「現代的」，又是「有中國特色的」，能夠真正成為推動物質文化建設的動力和精神支柱<sup>34</sup>。

### 參、中國大陸的後殖民狀態

「文明的選擇」，這一近百年來始終困擾著中國大陸知識界的重大問題再次成為焦點。學術界引進了「文明衝突論」，由此確定文明基本架構的抉擇中的民族主義立場。流行於西方學院中的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東方主義等理論，被中國大陸的新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用來批判西方中心論以及西方的文化殖民的霸權。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持雙重標準，對外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內才實行一定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因此，中國大陸學術要堅持民族自尊，提倡「本土化」和「中華性」，抗拒西方文化霸權，從中國的經驗現象中提煉出全新的概念和理論體系<sup>35</sup>。在此藉著探析 90 年代有關文化批評論述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帶出後殖民主義在文化邊陲的認知和轉化，並探察後殖民主義研究所引起有關「中國性」的討論，為中國性在全球化論述生產的新格局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本土」民族主義式抗衡論述從後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中有關「民族論述」的爭論出發，再審視中國大陸「民間」和「中共」當局在面對這個新局勢時所作的反應，從而對全球化年代的「民族論述」作出省思。

#### 一、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主義論述於 7、80 年代在西方學院迅速勃興，至 80 年代末，這股批評潮流開始席捲亞洲。中國大陸在 1989 年以後，進一步落實改革開放政策以淡化政治上的衝擊，在文化上的所謂「後新時期」<sup>36</sup>正式開始大量引入「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息息相關的「後現代理論」，而在開放市場之餘，政治上仍然相當封閉，對西方的民主論述十分抗拒，而「後學」(Post-ism) 的另一主張後殖民主義遂乘時而興，變成了「反文化霸權」、「反文化帝國主義」的尖兵<sup>37</sup>。後殖民主義理論在 80 年代開始傳入中國大陸，雖然在當時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重視，但卻已埋下批判／反思的種子，

<sup>34</sup> 同註 18，頁 226-227。

<sup>35</sup> 徐迅，民族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7 月），頁 153-154。

<sup>36</sup> 自 70 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實施開放政策開始，中國文化進入了所謂「新時期」，80 年代一股「文化熱」帶出了人文精神的探討，而據王寧、張頤武等學者的說法，中國文化在 90 年代又踏入了「後新時期」。

<sup>37</sup> 朱耀偉，「誰的『中國性』？九十年代兩岸三地的後殖民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香港：第 19 期，2001 年春／夏季），頁 136-137。

並且在 90 年代快速發展起來。也就是說，90 年代初，「新的國學熱」的興起，意味著一種不同於 80 年代的、對西方理論的反省或拒絕；另一種趨向，則是繼續朝向「西方」尋找新的理論資源（或借用新的語詞）予以拯救。在後學熱中，出現了一種關於後殖民主義理論的介紹與中國「後殖民」情景的討論。這種類似討論更為切中 90 年代中國大陸的部分現實：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對抗「後冷戰」的「西方世界」<sup>38</sup>。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已經瞭解到中國必須要「走自己的路」。只是領導人礙於形勢和身分必須大力反對西方的價值 / 思想在中國大陸流傳而強調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而知識分子則想要藉由西方的價值 / 思潮來獲得讓中國快速改革並且發展的方法 / 模式來走自己的路，兩者雖然在反西方與親西方上的觀點迥異，但希望中國發展成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則是一致的。「中國」這一主體是兩者的共同目標。所以當 90 年代中國大陸的國力日益增強且足以與西方相抗衡而引起西方的戒慎注意之時<sup>39</sup>，中國大陸上 / 下會一致的將西方的心態視為是一種霸權心態的展現，是一種西方中心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後殖民主義批判中所要強力譴責的，因此，後殖民主義理論才能快速地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形成一股風潮<sup>40</sup>。後殖民主義研究在 90 年代中國大陸廣受重視，但在性質上仍是以引介西方理論為主。有關後殖民主義研究在中國大陸所產生的影響則最能體現於有關「後學」與中國大陸「新保守主義」的爭論<sup>41</sup>。

王晴佳認為，「後殖民主義」這一思潮與「中國學術」有一定的關係，他又強調說，後殖民主義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並不完全是因為近代中國有過一段「半殖民」的歷史，而是由於它所涉及的内容，與中國大陸目前的「文化建設」有不少聯繫。其主要理由是，雖然後殖民主義在現代西方學術界引起重視，但其内容性質，則並不完全隸屬於西方的思想文化傳統。相反地，後殖民主義的主要内容是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反省與抨擊，但同時也包括對「非西方文化」在近代發展的反思和批評<sup>42</sup>。

## 二、中國大陸的後殖民主義之意義

80 年代世界文化的胸懷、西方中心、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與 90 年代「本土」

<sup>38</sup> 戴錦華，「文化轉型與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研究（香港：1999 年第 5 期），頁 70。

<sup>39</sup> 例如：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等。

<sup>40</sup> 同註 14，頁 97。

<sup>41</sup> 同註 37，頁 138。

<sup>42</sup> 就其思想淵源來看，後殖民主義是一個「雜交」(hybrid) 的產物。這一「雜交性」(hybridity)，正是後殖民主義的一個思想特點；正因為有其雜交性，因此後殖民主義的內涵就變得十分豐富，其內容不但與那些直接受到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國家有關，也可以運用到當代國際文化關係的分析上。因此，我們決不能簡單地將之視為一種「反西方」的理論表述。參見：王晴佳，「後殖民主義與中國歷史學」，中國學術（北京：2000 年秋季、第 3 集），頁 255。

文化身分的指認、自覺的民族反抗，及不無病態的民族主義狂熱，其實不曾截然劃分過，始終是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始終是隱現於近代到今日的中國大陸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表述之中，只是難以迴避的悖論還是依舊。當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擁抱民族主義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權」時，所用的武器，包括語言、範疇和論說方式及論述風格，幾乎還是來自於西方。尤其是對「反西化」持「後殖民主義」的文化批判者而言更是如此<sup>43</sup>。

後殖民主義理論有特定的使用範圍，不是整全性的理論話語，不可隨意搬用。從後殖民主義的原意來看，它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因為在幾百年的中西交流史上，中國從來沒有被西方列強殖民化。作為一個整體，中國一直是個主權國家，至多只是毛澤東所稱的「半殖民地」國家，和歐洲殖民地有根本的區別。因此，如果在中國硬套上後殖民主義理論很容易出問題，所謂的「後殖民性」問題也和中國的現實沒有直接聯繫。但是，中國百年的受侮史及「半殖民地」的說法至少表明在中西文化的長期交流中，強勢的西方文化對弱勢的中華文化實施了明顯的暴政和文化霸權，這種中心對邊緣的壓迫自然也會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的誤徵誤現中，因此，後殖民主義理論可以在這方面得到利用<sup>44</sup>。也就是說，儘管在形式上「中國」從來就不是殖民地，但其在西方強權與日本手下所蒙受的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可以說跟正式的殖民地沒有太大的差別。這顯示，研究「西方與非西方」互動的新方法論和新認知，即是後殖民主義，同樣可以適用於中國的例子<sup>45</sup>。

後殖民主義理論話語移植到中國大陸之後，可能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將社會文化中的許多基本力量，整合到一個「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回潮與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等「後學」引進密切相關，因為不論是「新左派」抑或「新保守主義」都以其為理論武器，一方面暴露出知識分子在商品化經濟潮流下日趨邊緣化的認同危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全球化時代的後殖民世界格局，對現代性的反思被移置到對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可能捲土重來的認知場域<sup>46</sup>。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後殖民主義論述讓中國人反思到自己的「民族認同」問題，並且由此出發去檢視／驗證與西方的主、客體位置，從而去瞭解「西方」相對於「東方」

<sup>43</sup>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觀察未來中國大陸民主主義發展的重點（臺北：致良出版社，1998年11月），頁155。

<sup>44</sup> 朱剛，薩伊德（Edward W. Said）（臺北：生智文化出版社，1999年3月），頁224-226。

<sup>45</sup> 韋思諦（Stephen Averill）著，「中國與『非西方』世界的歷史研究之若干新趨勢」，新史學（臺北：第11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71。

<sup>46</sup> 陳泓達，中共意識形態的後殖民意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批判性詮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5月），頁12。

是一個「他者」。在這種思維向度下，西方的理論和思潮、典章制度、文藝文化都可以為中國人接受，但必須是在中國作為主體／「我者」的身分下接受，而不是被強迫／被制約的接受，而接受之後必須要以「我者」的角度去審視這一切、利用這一切，而不是盲目的／被動的去接受／作為<sup>47</sup>。

總之，在當前的中國，隨著後殖民主義論爭的深入進行，Homi Bhabha 的批評實踐和話語策略越來越對有著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傾向的青年批評家產生誘惑力，這主要體現在關於全球化與本土化、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類二元對立的爭論上<sup>48</sup>。後殖民主義作為與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種對抗性的策略就很容易與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反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鬥爭相認同，這種認同不僅體現在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同時也體現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本土主義」或「本土化」<sup>49</sup>。就是說，後殖民主義理論卻經常被等同於一種民族主義的話語，並加強了中國現代性話語中的那種特有的「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sup>50</sup>。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對於「認同」的觀念，在 90 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中，常常被應用在解構主義理論批評歐洲中心主義與西方現代性的同時，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分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 三、中國大陸的後殖民主義之反思

中國大陸學者們就後殖民主義問題展開爭論時，並不參照或引證西方公認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 Edward Said, Gayatri Charavorty Spivak 和 Homi Bhabha 等人的原著，更不用說以深刻的理論剖析和批判性的洞見在同一理論層次上介入國際性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爭鳴了。自然，這種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誤解或誤讀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抨擊和批評，儘管這些嘗試確實也在中國文化的語意之下產生了一些不同於西方語意下的後殖民主義的變體<sup>51</sup>。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被陸續介紹到中國大陸，同時也被不同程度地運用於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成為 90 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話語資源之一，尤其是在大眾文化研究與後殖民主義批評中。但是應當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在進入中國大陸以後，由於對不同的語意缺乏應有的反思與警醒，致使西方理論在中國本土產生了極大的錯位與變形，甚至違背

<sup>47</sup> 同註 14，頁 117。

<sup>48</sup> 王寧，「後殖民主義理論批判」，文藝研究（北京：總第 109 期，1997 年第 3 期），頁 10。

<sup>49</sup> 同上註，頁 12。

<sup>50</sup> 同註 33，頁 36。

<sup>51</sup> 同註 48，頁 5。

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與靈魂。

後殖民主義由於源出第三世界和具有「反西方中心論」的風格而受到中國大陸學界的重視。後殖民主義理論對中國的「文化解殖」和「文化自我形塑」具有積極的參照意義。但是，基於各種「誤讀」<sup>52</sup>，後殖民主義一方面被簡化為呼應「官方話語」，即是「走向世界」的介入策略；另一方面被導向一種民族本真性的回返，從而使「後殖民主義」對中國文化的積極意義還未能出現<sup>53</sup>。反而，在90年代的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的語意中的「反文化霸權」變成了共有批判工具，一時間「中國特色」的爭奪主宰了整場辯論。後來，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sup>54</sup>。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

## 肆、社會主義的反思

中國大陸已經快速地進行了「開放」，資本主義的問題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中叢生。全球化的浪潮又更加劇地衝擊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sup>55</sup>意識形態。因此，中共必須要在意識形態上釐清一條明確的道路，或者重建其社會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堅持的社會主義，如何與資本主義操作邏輯符合，這就必須談到9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所呈現的已是一種「後社會主義」，換言之即「後資本主義」。

### 一、全球化語意下的中國社會主義

中國的社會主義，可說是在以西方為對話的語意中興起。而在繼承西方思潮馬克思主義的初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面臨到西方/東方思想的對立，也就是說，要處理在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同時，為何又引進西方的思想的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面臨國際派、本土派的鬥爭與思辯後，成功的建構了一套

<sup>52</sup> 中國文化「潛意義」在這「誤讀」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sup>53</sup> 宋國誠，「後殖民理論在中國：理論旅行及其中國化」，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3卷第10期，2000年10月），頁2-3。

<sup>54</sup> 同註37，頁139-140。

<sup>55</sup> Eric Hobsbaum 認為，「社會主義」一詞本身並沒有政治性，也不意味著社會組織的特定方式。不同於「共產主義」一詞的是，「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度而不是私有制度為基礎，並且按照公有制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就政治哲學的意涵來說，「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是「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的對立面應該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個人主義」。但是，由於19世紀時，「個人主義」社會的核心就是競爭，也就是「市場」，因而「個人主義」往往與「資本主義」被劃上了等號，「社會主義」也就被認為是具有「反資本主義」特性。參見：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1月），頁82。

屬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本土化」的過程，其實踐才有可能<sup>56</sup>。在這樣的邏輯之下，當時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上取得了主導的地位。

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中國開始走一種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甚至，在刻意反抗資本主義的同時，還要建構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國家。在源自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順利的中國化之後，中國陷入了一種對西方世界全面反動的氣氛中，尤其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在一方面想要脫離西方世界影響；而另一方面則想要重新建構一個世界中心的情境下，中共塑建一個「第三世界」概念<sup>57</sup>。但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開始對外開放，使得以美國為主的文化及商品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一方面影響著社會主義思潮下的中國大陸社會；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本身亦開始在與西方對話的同時，反思及尋找自我定位。

在後毛時代，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一種共謀共生的關係，不可再將「社」與「資」看成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範疇。而且在鄧的觀念中，必須跳脫把世界劃分成社與資二元概念／陣營的想法，必須重建中共的世界觀，即必須將過去世界分成兩大相互對立的經濟板塊的觀念，重新打成一塊／視為一塊，即「全球」這一塊整體，以全球／整體作為一個單位，由兩個市場的觀念回到一個市場的觀念，回歸到以全球為市場的觀念。所以，社會主義必須重建其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係，不能再如同改革之前的中國選擇自外於此體系。「改革」與「開放」的觀念也是在此邏輯下形成一種相互配套的關係<sup>58</sup>。更具體的說，中共的經濟改革不是單純的回頭去補「資本主義」的課，而是走一種「後社會主義」的模式，走一條「融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經濟發展道路。就是說，經濟改革是建立在允許市場存在／運行的前提下展開的，因此，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兩點主要目的：其一是允許市場機制在既有的計畫體制上不斷提升其角色與位階；其二則是通過市場的存在／運行來重建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共企圖利用上述兩點目的通過經濟改革的手段來重建中國與西方市場／資本主義的關係，但必須要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兩者之間形成一個共生發展的關係。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宣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方面宣示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宣示延續過去的革

<sup>56</sup> 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臺北：生智出版社，2000年4月），頁9-10。

<sup>57</sup> 黃健群，解讀九十年代晚期中國城市流行文化：由文化研究向度看網際網路發展現象（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頁54-56。

<sup>58</sup>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臺北：生智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頁143-144。

命經驗與傳統，降低兩者之間的矛盾點。這就是說，鄧小平為甚麼要走出一條有別以往的「後社會主義」道路來<sup>59</sup>。

中國大陸進入全球化的市場體制之後，必須要面對的，是處理現代化中「人」的重新定位及與科技文明的關係，而非已經逐漸解決的物質資料的滿足。更簡單地說，以馬克思的社會結構來論述，上層結構的文化、意識形態與下層經濟基礎已是相互辯證、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傳統的經濟決定論在90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陸已必然如西方高度工業發達國家一樣面臨調整，社會主義的轉向必然是向後社會主義前行，他既非傳統認知上的社會主義，亦非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然而，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後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要面對的是「自我認同」的問題，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時代下的中國大陸自我定位、自我意識<sup>60</sup>。以儒家精神重塑帶有資本主義特色的後社會主義，事實上只是為中國大陸在與西方接軌的過程中重新建構一個自我認同，而這個認同是奠基在傳統認知「中國文化」上的。

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是把「社會主義」視作「現代化」以及「現代性」的對立面。換言之，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或現代化道路，就是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或現代化道路。但在90年代現代性反思中出現了另一種思路：從「一種」現代性模式理論轉向「多種」現代性模式理論。具體到中國的情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社會主義也不是現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種」現代性方案，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為特徵的現代性話語。簡言之，改革前的社會主義與改革以來的社會主義的分別，也就不是現代性與前現代性的區別，而是不同的現代性方案的區別。這就表明了，90年代反思現代性的部分學者已經轉而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角度、從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意義。更準確地說，從比較的意義上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與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關係、區別以及正、負面意義與價值。其結果，首先是導致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尤其是毛主義的重新評價<sup>61</sup>。

也就是說，在8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社群的歷史反思集中於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上，而社會主義模式往往被視為是「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大陸的知識社群而言，現代化一方面是尋求富強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途徑；另一方面則是以西方現代社會及其文化價值為規範來批判自身社會和傳統的過程。因此，中國現代性話語最主要的特徵之一，也是訴諸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等二元對立模式對

<sup>59</sup> 同上註，頁135-136。

<sup>60</sup> 同註57，頁57-59。

<sup>61</sup> 同註17，頁19-20。

中國自身的問題進行分析<sup>62</sup>。90年代有些持有社會主義立場的人，則常常僅僅因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所謂「批判意義」或「抗衡意義」，而將之全盤肯定，卻忽視了社會主義現代性在許多方面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同源同根關係。也就是說，他們把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同當作了肯定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唯一的與至高的理由。90年代的中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已經不能在「單一的社會主義」語意中解釋。但是，誇大「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程度，無疑會忽視中國大陸是在社會主義體制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化」，無論是市場化還是世俗化，因此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sup>63</sup>，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總之，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向及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合作，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情勢。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實際的操作已是一種辯證的存在。中國大陸要處理的問題，不再只是單純化約姓「社」姓「資」的問題，而是如何成為一個高生產力，高科技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因此，「市場」的存在及加大，表現在商品經濟的日益蓬勃及熱絡<sup>64</sup>。陶東風也認為，中國大陸的現實已經悄悄地進入「既非社會主義又非資本主義」、「既是社會主義又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sup>65</sup>。也就是說，雖然中共仍然強調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但是中國大陸從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起，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已經變成逐漸接受資本主義而不放棄原有社會主義立場的一種表述方式。90年代的中國大陸已不能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而是與後資本主義操作上有內在一致性的後社會主義。後社會主義所預設的是其與世界經濟體的接軌。

##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就面對必須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互動關係之問題。從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了「文化熱」，企圖尋求出一套有別於改革開放之前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態度；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之間的角色和地位，應該如何重新定位，也相應的成為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運作造成了很大衝擊<sup>66</sup>。「傳統主義」與馬列主義的關係在中共成立之後，一直就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關切的焦點議題。就中共而言，如何看待傳統主義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是一個與自身意識形態的發展具有密切關聯的重要課題。

<sup>62</sup> 同註46，頁11。

<sup>63</sup> 同註17，頁20-21。

<sup>64</sup> 同註57，頁56。

<sup>65</sup> 同註17，頁22。

<sup>66</sup> 李英明，現階段大陸政經社會發展與兩岸關係（臺北：永然文化出版社，1994年8月），頁127-128。

馬列主義作為一個外來文化的思想體系而進入中國，多少反映出中國自身的傳統思想在面對急劇變遷的社會危機時所顯露的困窘處境。然而，「傳統文化」在馬列主義進入中國的過程中並不是完全地「虛位以待」，也不是採取頑強激烈的拒斥反應，就是說，來自於傳統的思想與文化是在「欲迎還拒」的過程中，一方面既是自覺地接受馬列主義外來思想對自己的救贖；另一方面也是被迫去面對馬列主義所可能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就此而言，儘管傳統主義的思想與文化在內涵上與外來的馬列主義具有相當的歧異性，然而，兩者之間卻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共通思維形式，才使得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條件成為彼此得以結合的特殊紐帶<sup>67</sup>。

總之，思想與文化的傳承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之延續，而無法以人為的、政治的力量加以任意的割裂、破壞與斬斷。任何一個高唱「反傳統」的激進主張與行動，都將無法逃脫於其所反對的傳統影響之中。同樣的道理，在改革開放後，中共雖然展開對傳統主義恢復與認識，然而，來自於馬列主義以及官方意識形態框架的影響卻也同時成為反思的前提要件。這是共黨統治中國的政治文化效應，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反思」傳統文化與思想下的「小傳統」<sup>68</sup>。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形構過程中，儘管已經開始恢復與正視傳統主義的內在價值，但此時的傳統主義卻已經含化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經驗內涵。換言之，傳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是產生了裂變與持續並存的雙重面貌。就作為馬列主義的對立面而言，傳統主義是中國自身固有的歷史、文化與思想的特徵，但就當代共黨中國的特殊情況而言，傳統主義已經成為統攝馬列主義變體的特殊心理與社會政治的概念。

## 伍、結 論

90年代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中國文化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知識分子菁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多元文化格局<sup>69</sup>。並且，自80年代以來，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和「回歸傳統」三個思潮雖不敵「西化」進步思維的氣勢，但也在文化場域中占有一些空間，並引發不少爭議<sup>70</sup>。其結果，從文化精神上來

<sup>67</sup> 張國聖，改革開放後之中共官方意識形態：衰退與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6月），頁231。

<sup>68</sup> 同上註，頁234-235。

<sup>69</sup> 同註27，頁9。

<sup>70</sup> 例如，「現實主義」是否定「烏托邦」理想而出現的，講求功效、不惜代價，最明顯的現象是鄧小平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下所進行的「資本主義大躍進」和「六四」後縱容消費文化的擴張，雖然都有否定舊意

說，90年代存在著「西方文化」、「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鼎足的格局<sup>71</sup>。也就是說，8、90年代討論最顯著的特點是將中西文化論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聯成一體，從而大大加強了理論與實踐、傳統與現代、回顧與前瞻、引進與繼承、菁英與大眾的結合，並把文化重構這一根本問題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想，失去了統治一切的效力，才會出現這種「多種主義」並存的局面。

但對很多中國大陸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講，90年代卻是充滿困惑與無奈的時代。在80年代「文化熱」的潮流中，人文知識分子似乎成了領導社會新潮流的一股中堅力量。80年代的文化熱、文化反思，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相互推動，交相輝映。但在90年代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90年代與80年代有明顯的分界<sup>72</sup>。這必須從「全球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角度去觀察其變化<sup>73</sup>。也就是說，自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歷經了一股延續五四以來的中西文化論辯。中國大陸學術界借用西方的去中心、對主客體解構及消解的批判性理論，去進行內部文化反省的同時，卻陷入了一種「反西化」，卻同時反對「中國文化本質化」的新保守主義。在此進程中，「後殖民主義論述」在此扮演的正是這種悖論式的角色：反文化本質主義暨同時反西方。而在後殖民語意下的中國文化，必然不得不辯證的在「本土化」與「全球化」二元對立中不斷尋求一種有別於傳統經驗及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道路<sup>74</sup>。

徐賁認為，中國大陸社會將「反西方文化霸權」作為首要任務的批評，事實上，和官方政治宣傳中之反帝、反殖以及對集體統一和民族主義的強調有著相似之處。同時，這種將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話語壓迫上升為主要壓迫形式的做法，亦有助於「掩飾和迴避了那些存在於本土社會現實生活中暴力和壓迫」，因此，它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共處，而且以其捨近求遠、避實就虛的作法，順應了官方的利益，提供了一種極有利於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和化解的所謂「對抗性」的人文批判

---

識形態的傾向，但是正是激進思潮中的功利主義現象。現實主義在民間的表現則是個人主義的興起，消費主義氾濫以及對政治抱持冷漠的態度。而「保守主義」則發生在政治層面，興起一股強調秩序和權威的統治形式。至於回歸傳統在官方意識形態中是為了尋求統治的合法性及煽動民族情緒，但表現在民間方面則有「東方神秘主義」的復甦。雖然以上種種均能解釋為80年代反傳統情結的消解，但卻也是文化認同的困境及誤區。參見：同註21，頁162。

<sup>71</sup> 劉登閣、周雲芳，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193。

<sup>72</sup> 中國大陸在80年代是借用「西方」理論，而到了90年代，中國大陸則已經能夠對西方理論帶有批判性的眼光。參見：Wang Fengzhen, "Third-World Writers in the Era of Postmodern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No.28, Winter, 1997, pp.53。

<sup>73</sup> 劉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頁「前言」1-3。

<sup>74</sup> 同註57，頁77。

模式<sup>75</sup>。也就是說，80、9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分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sup>76</sup>的建立<sup>77</sup>。

在90年代的中國大陸，中共儘管面臨著多重危機與權力的相對削弱，但仍強有力地制約、控制著總體局面，並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動員並整合社會力量。此時，經典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仍是不斷被借重的工具，並成為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sup>78</sup>。Steven W. Mosher認為，國家正統論的守護者，最近抓住了「大漢沙文主義」或者「大中華主義」作共產主義的代替品：一個強有力且集民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傳統主義、民族優越感以及文化主義於一身的「中國特色」綜合體<sup>79</sup>。事實上，在1990年代的歷史情境中，「民族情感」<sup>80</sup>有內外兩方面的作用：對外要解決的是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定位問題；對內則要解決民族凝聚力的問題。在全球化大潮面前，官方和民間共同製造出了「民族情感」或者「中國心」的話語，以此增強民族凝聚力。這個話語強調中國的「獨特性」，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sup>81</sup>。

總之，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不但在經濟領域內存在著多元化，而且在其他「非政治」領域內，在不影響國家政治穩定的條件下，也已經出現「有限的」多元化。社會文化、教育、娛樂、學術研究、非政治的結社，作為「第二文化」，與政府主導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另一方面則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國家機器仍然保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符號體系，作為黨組織的整合與黨內凝聚的基礎。國家統治機器也已經揚棄「教條的」意識形態，原先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話」，已轉而尋求以「經濟實用」來獲得人民對政權的同意與支持<sup>82</sup>。90年代意識形態文化失去了當代文化中的某些意義，誰也不得迴避意識形態的支配，因為無論任何體制的國家，都有貫徹自己國家意志和利益的意識形態。同樣的中國大陸也在逐漸放寬其意識形

<sup>75</sup> 汪暉、余國良主編，九〇年代的「後學」論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8、91、180。引用於羅曉南，「九十年代『反西化思潮』理路探源：從『後學』論爭談起」，東亞季刊（臺北：第31卷第4期，2000年秋季），頁10-11。

<sup>76</sup> 這裡所謂的「另一種文化霸權」就意謂著一種「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霸權而成立的。

<sup>77</sup> 同註38，頁57。

<sup>78</sup> 同上註，頁73。

<sup>79</sup> 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可見於官方出版品中，也可以在半官方文件中見到。參見：Steven W. Mosher著，*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李威儀譯，中國、新霸權（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頁105。

<sup>80</sup> 「民族情感」或「中國心」的話語需要一個對立面和參照係。

<sup>81</sup> 史安斌，「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的答問：劉康訪談錄」，收錄於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主編，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2-103。

<sup>82</sup> 蕭功秦，「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中國之春（香港：總第182期，1998年12月），頁31-32。

態的強制力，因為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共不得不加以警覺和拒絕「意識形態」、「統治結構」、「市場經濟」三者之間的「一體化」。因此，它們為了放寬意識形態文化的控制，企圖採取跟過去隔絕的措施。